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访谈：再造“公共显现的空间”

——作为一种抵抗的建筑学

Interview with Kenneth Frampton: Rebuilding the Space of Public Appearance——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孙志健 | SUN Zhijian [美]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 Kenneth Frampton

中图分类号: TU-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2-0092-10

DOI: 10.12285/jzs.20210526002

摘要: 访谈从“巨构”与“巨型”建筑的概念辨析引出弗兰姆普敦一直致力实现的“公共显现的空间”，并以此为理论线索展开关于当代大都市的功能问题、全球化时期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对中国当代建筑的观察与反思、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建造诗学的政治潜力、建筑文化以及后疫情时期的公共空间思考等角度的讨论，最后通过20年来对建筑学一系列批判反思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重新锚固今天建筑师和理论家的角色，探讨解决建筑学当前困境的可能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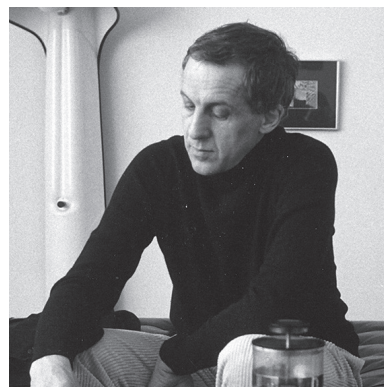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巨构、批判性地域、公共显现、建构、抵抗

Abstract: The interview starts from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between “megastructure” and “mega-form” to introduce his long-term concentration on “Space of Public Appearance”, which acts as a clue for unfolding the discuss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problems of program in contemporary cities, critical regionalism under globalization, reflection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political potentials of tectonics, architecture culture and public spaces in post-COVID time etc. Finally, the new role of architects and theorists was reconsidered through th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to discuss how to deal with current predicament in architecture.

Keywords: Megastru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Public appearance, Tectonics, Resistance

引言

2020年7月末，弗兰姆普敦从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划上了圆满句点——作为史学家、理论家和评论家，他在学界的地位如此特殊，是建筑史上注定无法被忽略的人物，无论是其《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①，还是《建构文化研究》，都将现代建筑置于当代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化问题中反复交互碰撞并时刻进行批判思考，发人深省。他生于1930年，1950年进入伦敦建筑联盟学院师从史密斯夫妇等人，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拍摄于1981年《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完成之际 (图片来源：其妻 Silvia Kolbowski 拍摄，原图网址：<https://www.soane.org/soane-medal/five-voices-kenneth-frampton>)

作者:

孙志健，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全球知识雷锋”副主编。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威尔讲席教授，著名建筑评论家、史学家、理论家。录用日期：2021-8

1962年进入《建筑设计》AD杂志，4年后成为彼时堪称前沿理论阵地的《争鸣》(Oppositions)期刊创始编辑之一，1972年任教于哥大直至退休，但他对学科的深刻影响从未因此终止，正如2018年他被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评论为“在促进建筑的关键价值及其社会作用方面是真理的声音”^②。

2020年8月“全球知识雷锋”公众号借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契机^③，有幸在纽约采访了年逾九旬的弗兰姆普敦——他居住的砖砌联排别墅是19世纪遗留的铁路工人住宅(图1)：颇具工业痕迹的破旧别墅的排水管会越过人行道把雨水直接排到街上，别样的生活气息在纽约难得一见。这种质朴生活与他消费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所持的警惕态度如出一辙，精神世界的充盈永远与物质欲望无关——这位对批判性建筑充满深思的理论泰斗再次证明了这点。他已过耄耋之年，尽管身体机能和记忆力有所衰退，许多细节需妻子西尔维亚(Silvia Kolbowski)提示，但他精神矍铄，退休后坚持评论写作和学术研究，每周末使用iPad处理邮件并精读文章，似乎年岁并不是衰老的标签，思想层面的智性使人永葆青春。他对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作品信手拈来，对哲学著作旁征博引，同时对当今复杂的特大都市问题、建筑表皮布景、消费文化和生态危机等问题暗含忧惧，对此他斩钉截铁地强调“公共显现空间”的目标，主张以建造诗学作为抵抗环境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阵地——雄辩和睿智让人赞叹。此后我们一直保持沟通，探讨了关于巨构、景观、地域、建构和批判文化等诸多理论，受益匪浅。2021年他于伯克利^④和利物浦相继举办“建筑学反思”主题讲座，将当代反思浓缩为奇观、大都市带、栖居、地域性、建构、巨构等关键词。笔者的困惑之处不仅是这些议题的内在联系与逻辑，还有批判性地域主义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觉醒，如何在中国当代独特的建筑语境下落地生根？我们是否有望培育出一种中国特有的反思性的地域主义？此外，“公共显

现”作为人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政治概念，是如何适用于建筑理论的？弗兰姆普敦提议不如对诸多问题进行一次完整的访谈予以解答，本文为访谈的全文记录(图1)。

一、巨构与公共显现

孙志健(以下简称S)：斯坦·艾伦(Stan Allen)多次提到深受您的巨构理论启迪^⑤，他谈到“巨型”(mega-form)和“巨构”(megastructure)两个词。您在杭州演讲^⑥时讨论过两者的区别，但我记得1964年楨文彦(Fumihiko Maki)提出集群形态^⑦时却用两者表达相同含义，所以我想问这两个词是否完全相同？

弗兰姆普敦(以下简称K)：我觉得它取决于这个词何时问世及具体语境，“巨构”一词出自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1976年的书《Megastructure》，书中经典案例是皮亚诺和罗杰斯1972年设计的蓬皮杜中心；而“巨型”是楨文彦在1964年出版的《集群形态研究》中提出的。其一，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各有侧重，正如字面含义：巨型强调形式，而巨构侧重结构，当然形式和结构是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楨文彦将两者混用是因为他相信巨构只是一个巨大台基，其上搭建的体量可以自然生长。但我认为这是侧重点的问题。巨型的第一个特质是形式上的连续性——尤其在水平方向，这点同样体现在蓬皮杜项目。其二是功能计划(program)，探索这种功能的可能性是当务之急，因为传统层面的城市设计已不复存在——城市在错综复杂的资本运作下日

益碎片化，我们也没能力再创新城市，因此我将巨型视作激活城市新地标的一种媒介，有些巨构同时是地景建筑，例如西雅图雕塑公园(Olympic Sculpture Park)处理的就是现存道路铁路系统、它们之间被割裂的废弃土地以及水系，公园的坡道既保持了下方的正常运货行车，又与水系保持联系，公众也能从地面进入。我觉得艾伦的《地景建筑》(Landform Building)书名正是指这座公园。杭州讲座标题与我2009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的课题同名，是指巨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景观：1929年柯布西耶在里约热内卢规划案中提出解决拥堵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汽车放在建筑顶部，在其下建造公寓，因此我说巨型变成都市景观，典型案例是昂里克·米拉莱斯(Enric Miralles)1994年在巴塞罗那设计的伊瓜拉达公墓(Igualada Cemetery)——石块组成的大地景观以及一座根据地形起伏和山势下跌而建的墓群(图2)。正因为今天的城市在不同资本运作下变得支离破碎，传统的整体规划与城市设计已成侈谈，我才对此提出巨型概念——建筑嵌入城市交通和地形之中的同时又能作为景观独立运行，它衔接地景并缝合碎片化空间，再造批判性场所和新型城市地标。

此外我还引用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公共显现(public appearance)的空间”的概念，她认为人们通过行动轨迹使自己脱颖而出，公共领域因承载了行动者的理想而具有潜在的不朽特质，因此公共显现就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行动和语言从群体中显现出来。我认为在这种空间中社会依然能实现某种潜在主权，例如达·洛查(Paulo



图1：Kenneth Frampton访谈，纽约，2020年8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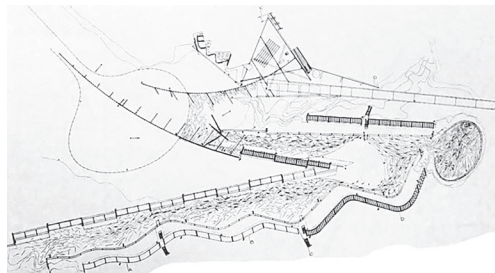


图2：伊瓜拉达公墓，EMBT，1984—1994年

Mendes da Rocha) 1958 年设计的保利斯塔运动俱乐部 (Paulistano Athletic Club), 就是巴西的公共显现空间, 它通过悬索屋面和悬挑混凝土鼓励行人自由渗透, 而他 1964 年设计的布塔坦自宅 (Casa Butanta) 更是把建筑悬浮在地基上, 将住宅想象成公共显现空间 (图 3)。传统社会的小村庄或城镇广场也是一种公共显现, 而城市的凋零必然与公共空间的衰落相伴相生, 因此我用巨型介入城市公共空间: 它首先是形式问题——与地面平行的水平方向的连续形式; 其次是功能策划, 尤其是公共层面的功能。

S: 这或许是您说“巨型作为城市景观”的原因, 我想问库哈斯的“大” (bigness) 是否与您提的巨型有关, 因为在《癫狂的纽约》中他也谈到“大”与城市的关系——“大”是城市的一部分, 它甚至就是城市。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建筑是什么, 但我们真的理解“城市”是什么吗? 这也是个大问题。

K: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认为库哈斯没有深挖功能的涵义——“大”建筑的公共内容可以是什么? 所以我对他的概念持批判态度。今天访谈之前我突然想到巴西有个提供文娱、教育和体育设施的特殊公共机构 SESC, 丽娜·博·巴迪 (Lina Bo Bardi) 设计的第一座 SESC 庞贝亚中心 (SESC Pompeia) 位于圣保罗, 这是一座旧工厂结构保留后改造成的市民空间。但更多被提及的是达·洛查 2017 年设计的 SESC 综合体, 它建于圣保罗市中心的旧

百货商场中, 底层作为大型公共场所对周边社区开放, 开放空间序列体现在每层的室内广场、部分架空、空中露台和屋顶泳池——这符合我想象中的巨构形态。也正是在圣保罗有大量校园空间被设计成社区中心——学校 24 小时开放, 白天作为校园, 夜晚和周末时变成社区中心。这类妙趣横生的校园在圣保罗的贫民区至少有 40 个——由社会主义政府和工人政党进行管理。在这些大规模自建住房中为人们提供活动中心, 离不开其城市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而巴西城市与美国不同: 它缺乏足够的公用设施, 因此如果你将学校概念稍作延伸, 或许它成了小型图书馆——集体空间在夜晚可用作体育活动, 甚至可以与某些服务机构并置——例如康养医疗部门。一个学校概念能衍生出千差万别的复合功能计划, 所以哪怕小尺度的单元都能重塑我们乡村的活动中心。

二、中国当代的批判性地域主义

S: 巧合的是我上学期在研究丽娜的圣保罗艺术博物馆, 它的底层大跨正如您所说的在不同阶段产生复合功能——集市、音乐会、展览等, 甚至它所处的保利斯塔大道有不少类似的沿街架空, 应对多重功能的灵活介入, 因为这条街有特殊政策: 每到周末只许行人通行, 所以公共性被无限放大, 构成了圣保罗独特的地域性。其实我们已多次讨论地域性, 当我问您批判地域六点是否包含人类学时, 您回

答说“在软学科中, 哲学或许比人类学更管用, 因为它强调了主体存在的整体体验”。所有理论都有自身特殊语境, 这篇论文是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的, 但今天我们有了全新语境, 那么今天的批判地域相较当年观点有所改变吗, 尤其是结合当代中国建筑语境——例如王澍、李翔宁和刘家琨的作品。

K: 是的, 我对当代中国建筑非常感兴趣, 它在全球的地位至关重要, 如今它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实践重心已从高速城市化的大都市转移到广袤的乡村地带, 大量年轻中国建筑师都以这种分散的方式在乡村聚落实践, 我所知道的有直向建筑、山水秀、DnA 和标准营造, 例如王澍在南方的乡土实践, DnA 事务所从功能策划、地域经济振兴和生态环保的角度前瞻性地使用木材, 标准营造在西藏的地域项目。他们都在乡村以区域性模式创造优秀作品, 这是振奋人心的现象。而“批判地域主义”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亚历山大·佐尼斯 (Alexander Tzonis) 与丽恩·列斐伏尔 (Liane Lefavre) 在《网格与路径》(Grid and Pathway, 1981 年), 论文中提出的概念^⑥的借用, 这里的“路径”是指季米特里斯·皮吉奥尼斯 (Dimitris Pikionis) 1957 年在雅典菲罗巴波山坡 (Philopappos Hill) 公园设计的地景——他在铺地中巧妙地使用回收的碎砖块和残留石材 (图 4)。论文中对希腊建筑师亚里斯·康斯坦丁尼迪斯 (Aris Konstantinidis) 的梁柱格网和皮吉奥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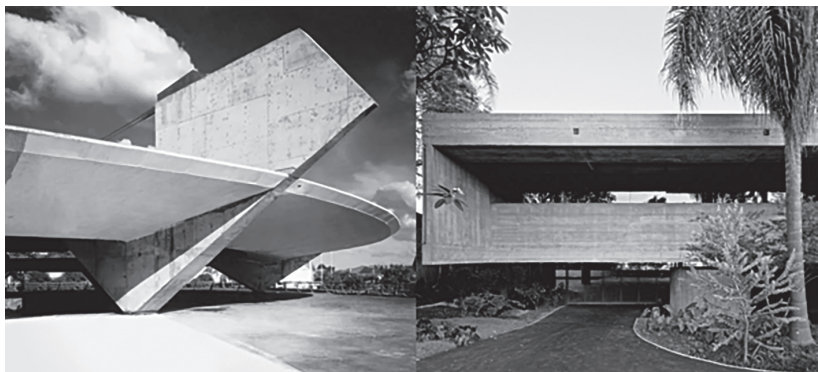


图 3: 保利斯塔运动俱乐部 (左) 和布塔坦自宅 (右), 达·洛查



图 4: 雅典菲罗巴波山坡公园铺地, Dimitris Pikionis, 1951—1957 年

的触觉地形学进行的比较评论，揭示了地形和人的现象学感知的关系。

我对此概念进行归纳与引申，发展了我自己的批判地域策略——其中“场所一形式”（place-form）对公共显现的空间至关重要，例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54年在《筑、思、居》中描述空间时，反对用将“空间”和“地点”混为一谈的德语词“raum”，反对将空间视为均匀细分的成分或无穷无尽的连续统一体，而是用具有明确围合感的拉丁词“间隙”（spatium）与“延展”（extension）。他对于场所的地形的立场不言而喻：人类文化应该与地形环境结合，我们应该回归事物的现象学存在本身，而空间的现象学本质主要取决于它具体清晰的边界。这时我又要谈阿伦特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因为她强调人作为群体聚集起来的优势，“权力生产中唯一不可或缺的物质因素就是人类共同生活，只有当人们紧密生活在一起，行动的潜能和力量便永远存在，这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所以我不认同文丘里“美国不需要公共广场（piazza）”的观点，因为如果美国人都坐在家看电视就掉入了“大都市带”^⑤（megalopolis）的陷阱，城市会逐渐失去人群和文化的力量，这些问题也是促成我思考地域的原因之一。王澍曾公开承认过批判地域主义对他的重要性，如果要我用批判地域角度对当代中国建筑共性进行总结的话，我想强调的是“材料”——这群年轻建筑师正炉火纯青地以优雅精美的方式运用材料，并精益求精，例如在山水秀的实践中既开拓了新材料，也巧用旧材料；而标准营造的作品是以新颖的方式去组织旧材料，这点在王澍身上也得到同样的体现，因为宁波博物馆使用了废弃村庄回收的残留物，通过旧砖瓦和当地传统民间工艺做成墙面，我认为这是充满巧思的具有文化性和装饰性的立面。

S：材料的确是最重要的维度，您给朱锴的御窑博物馆也写过评论——您认为如果博物馆拱面混凝土能略微裸露且拱形

开口也换成砖面会更好。如果将几位典型的中国当代建筑师进行对比，能看出建筑师们在新旧材料上倾注的思考，但可能更多是低技的材料，而非像福斯特那样的高技派采用的材料。

K：对，大多数中国建筑建筑师对技术不会持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态度，这区别于“盎格鲁-意大利”^⑥的高技派建筑师，如伦佐·皮亚诺、理查德·罗杰斯和诺曼·福斯特。如果说这三位中谁是材料方面的通才，我认为是皮亚诺——从陶瓦、木材到钢铁和玻璃涉猎广泛，而他总能以新手段处理旧材料。例如他1998年设计的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的吉巴欧文化中心（Tjibaou Cultural Center）项目中，他研究了当地土著棚屋的传统构造，创新地使用了胶合木材料，薄片结构和百叶窗可以适应不同气候。所以这三位中皮亚诺处理材料的手法最多元，但很明显，这一代中国年轻建筑师们在此之外还摸索出新方向。

S：我们谈批判地域时总会把重心放在“地域”上，但“批判地域”和“地域”一定不同，那么批判地域主义是否可能被误解为“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

K：是的，其实亚历山大在1981年用“批判”来修饰“地域主义”就是想把它与多愁善感的地方主义和乡土情结^⑦划清界限，所以批判地域主义绝不是乡土建筑理论的地域主义，因为它既不排除现代建筑的技术工艺，又能保持自身的地域识别性。批判地域反对的是对乡土建筑的煽情模仿，但不反对解释这些传统元素，甚至将它们作为片段融入设计——或许你会说亚历山大对地域主义持有右翼的理解，就像某些地区出现的著名的坡屋顶或地中海风格平屋顶。其实1983年我写完批判地域的论文后，在美国各大建筑学院作了不少主题演讲，经常遇到学生说“我们这里几乎没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化酿成的局面，同时暖通空调设备也是原因之一——这也是班纳姆批判的。整齐划一的新殖民风格的郊区住

宅遍布全国，数量剧增，完全无需考虑区域间的气候差异——从佛罗里达到中西部平原，相同的建筑类型俯拾皆是，正是空调设备和中央供暖助长了这种情形，也是我们没有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原因，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形成一种抵抗的建筑学以抵御环境的商品化，我们必须强调“建构”，将“土地工程”（earthwork）作为有效手段，便能为批判地域的话语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再建造的诗学

S：我相信批判地域在您的“抵抗的建筑学”中至关重要，但这是文化层面的抵抗，另一层面是建构文化，您提到的“土地工程”也多次出现在《建构文化研究》中，去年逝世的意大利建筑师维托里奥·戈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对这个词也有不少论述，同时它又与您提到的皮基奥尼斯的地形作品息息相关，您觉得它们之间有何关联？

K：戈里高蒂当然是重要的批判研究学者，他对我的影响是持久的——其实他在1983写过关于“土地工程”的论点：“对待环境只有两种重要态度：其一是模仿（mimesis），即对环境的复杂性进行有机再现；其二是对物质环境、形式意义及其内在复杂性进行诠释（assessment）。”而我在谈建构文化时说过皮基奥尼斯的案例是对其第二种态度的有力证明——尽管这个案例也多次出现在我对批判地域主义的论述中。亚历山大认为皮基奥尼斯的蜿蜒的公园砌道是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再现——砖石铺设随机且自然，仿佛生长于山坡起伏的地形，构成了一幅连续的地景，但它必须通过人的躯体和双眼同时感知，正如皮基奥尼斯1933年在《情感地形》（*A Sentimental Topography*）中说“我们身体在大地高低不平的表面游荡，每走一步都有交替变换的三维景色使双眼应接不暇”，所以我以此案例作为对戈里高蒂关于“土地工程”论述的补充。

S：这里所说的“土地工程”与森佩

尔的建筑四要素里的“基座”(mound)相同吗?

K: 这里“土地工程”表达的是建构与地形的关系,当然它也与人的身体体验相关——皮基奥尼斯的案例证明了场地远超我们的审美感知,因为只有动态的行走才能感受到土地全貌,身体移动会调动我们全身的神经系统与感官,甚至身体与土地能产生某种微妙共鸣,就像施特恩·艾利·拉斯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在《体验建筑》(*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指出声音的空间反射与吸收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建筑的心理体验,所以它也表达了建构与身体的关系。关于森佩尔的问题,我认为它更多是对森佩尔的建筑四要素的提炼,他曾将四要素定义为基座、框架和屋顶、火炉、形成围合的填充墙,这些是他在1851年伦敦水晶宫博览会中看到加勒比海地区的茅屋之后总结的。我对建构的评论主要将他的四要素提炼为“土地工程”和“屋顶工程”。“土地工程”可以作为抵抗的建筑学,是因为它在地景中的延伸体现了基地的演化,它通过将建筑融入场地来调和如今商品化的环境,因此它也与森佩尔的“饰面理论”(Bekleidungstheorie)有关——建筑外墙能同时揭露或掩盖基本结构。

S: 您在书中的观点是“建筑的本质是建构的而非布景术的(scenography)”,这是很绝对化的表述,您当时是否为了强调一种“抵抗”而刻意为之?在建筑本质的建构之外是否还存在人的感知要素?因为您说过写《建构文化研究》是为了抵抗后现代混杂的拼贴,是从建构诗学角度重新解读现代主义运动。

K: 这只是抵抗的一个层面,例如1983年批判地域的论文是回应1980年保罗·波特菲斯(Paolo Portoghesi)策展的首届威尼斯双年展,正如我说过这个概念受亚历山大1981年论文启发,并不是我首创的。回到建构的问题以及建构和材料的关系,我对建构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便是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因为建筑区别于音乐影视等其他文化形式的核心就是建造,

因此建构层面往往呈现出“反重力”倾向,毕竟建筑首先需要抵抗重力,但我认为今天中国年轻建筑师和实践重心在材料而非结构的表达,共同点是强调材料。这时回到你的问题——人的体验与材料的关系,我认为最有问题的是1980年后现代双年展的风格化的舞台布景式的图像学几乎都在强调视觉(图5),当时的核心展品“新街”(Strada Novissima)的设计师们都在追随文丘里1966年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提出的装饰蔽体(decorated shed)理论,我甚至觉得它是出自电影业的布景建造者之手,这种糅合各种柱式等历史元素的视觉图像拼贴促成了批判地域论文,而我对建构的论述大多始于这篇论文——它们都含有隐性的政治意味,我认为人作为主体会以现象学的方式感知环境,这种存在有它的政治影响。而侧重材料则强调了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综合体验,是一种现象学层面的对气候、身体和环境的触觉性(tactile)感知、人体穿越空间的移动状态以及视觉之外的感知环境的能力,例如阿尔瓦·阿尔托的芬兰市政中心(Saynatsalo Town Hall)的砖材,使空间中的行走成了特殊体验,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亲近感”(nearness)。我一直主张人作为主体会以现象学的方式来体验环境。

S: 所以建构理论和批判地域主义其实早已包含了人体感知的维度——因为您强调建筑的触感而非视觉效果。您谈到双

年展的展品运用了历史主义拼贴,这在文丘里1963年的母亲住宅也有体现:断开的山墙像巴洛克的断裂山花,弧线拱门像古典拱券,但它也有现代主义元素,如柯布西耶式的水平长窗,可以说是历史元素和现代的结合。前面您提到王澍的作品是批判地域的,但我认为他也是将砖瓦等传统元素与现代结合——甚至宁波博物馆中的砖瓦墙面是不承重的,可以说是饰面而非结构,因此我可以将王澍和文丘里的作品等同视之吗?

K: 两者截然不同,历史元素不是分析作品的首要特征。文丘里在1966年强调历史传统的借用——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元素从它们的语境中割裂出来进行糅合,如帕拉第奥式的山墙、弧线的古典拱券和断裂山花,正是这种混合使它们脱离了自身历史语境,沦为纯粹的图像符号,所以我说它是一幅含混的历史符号拼贴。我强调的“场所——形式”是确保历史元素的整体结构和核心文化被保留和延续,因此建筑对历史传统是一种谦逊的而非戏谑的姿态,这是第一点区别。第二点是我在批判地域论文中强调的建构,文丘里的历史元素只是作为装饰,例如母亲住宅的弧形拱券看似是结构的拱顶,其实门洞上方的水平过梁才是真正的受力构件,而我认为宁波博物馆中王澍思考了砖瓦和混凝土的材料性——它们的受力特性不同,所以王澍用混凝土建造了斜墙,而砖瓦则用于垂直墙体,这是两种材料的诗意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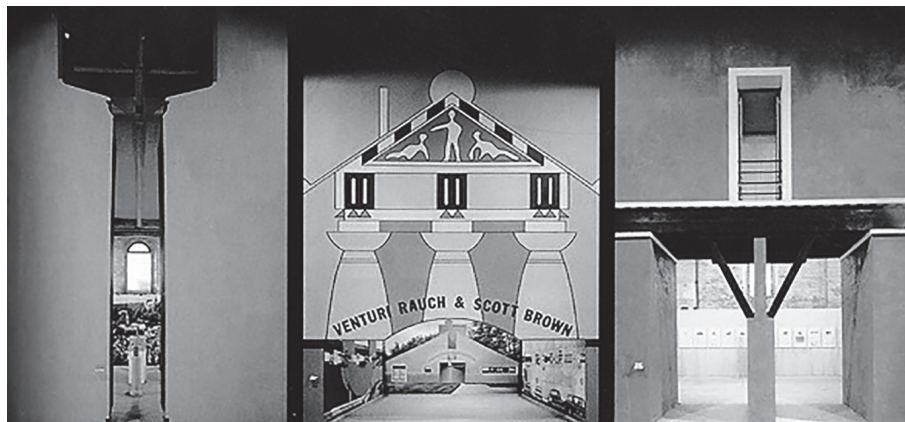


图5: 1980年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左起:Oswald Mathias Ungers, Venturi Rauch Scott-Brown, Maurice Culot and Leon Krier

外墙上回收的砖瓦混合物是不承重的，因为砖墙的特性使它无法建造高楼，所以内墙作为真正的承重结构通过托梁 (joist) 与砖瓦相连，博物馆的立面呈现出完整的砖瓦元素，但这与建构并不矛盾——我在论文中说过地域性不应排斥现代主义带来的先进技艺，虽然他在混合砖瓦中也使用大量差异化元素，但历史文脉始终占主导地位——绝不是矛盾冲突，而是一种自然的积淀。因此，我认为王澍的作品是批判地域的，这与文丘里的作品完全不同。

四、建构文化与技术传统

S: 其实不止王澍的作品，20年前您的建构理论在中国引起过广泛探讨，2004年您也参加过南京大学“结构、肌理和地形学”研讨会，正如您在书中认为“哥特建筑的交叉拱顶属于结构冗余，水晶宫的统一柱径不能反映柱子实际承受荷载的变化”，因此似乎建筑结构一定要清晰传达受力传递才能称为“建构”，而很多非线性作品的扭曲形式无法真实表达受力，我们往往认为它们是非建构 (atectonic) 的。

K: 不，正如我所说提出建构文化是反对当时大行其道的后现代布景术的视觉图像和文丘里的“装饰蔽体”理论，而非要为建构设定某种公式或法则。其一，正如我提到建构与地形和身体的密切关系，我在书中说它是建造的诗学，即诗意的建造，所以它是一种动态的综合性体验，不可能一成不变。其二，建构与新技术并不矛盾，因为当今时代没有人能摆脱数字化技术，一些中国的批判地域建筑也在运用数字化生产，所以数字技术与本土工艺也不冲突，技术与建构也不存在对立，甚至技术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例如巴西有钢筋混凝土建造文化，意大利有石膏磨光的传统工艺，瑞士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清洁设备文化，欧洲和拉丁美洲都有结构工程文化……因此，技术和文化也不对立。

S: 说到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当我问您关于今年普奖得主拉卡顿和瓦萨尔

(Lacaton & Vassal) 的看法时，您给我举了法国汽车的案例，并说“他们的实践是法国技术传统的延续，与批判地域主义截然不同”，但我认为他们在住宅改造项目中思考了法国传统文化、气候地形和建筑类型，应该与批判地域很相关，您是怎么理解的？

K: 他们无疑是杰出的建筑师，我在2020年《现代建筑》第五版中写过对他们的评论。他们身上体现的法国独特技术视角，与英国或盎格鲁—意大利的高技派截然不同。我们讨论过柯布西耶在1928年设计的装有轻质座椅的 Voiture Maximum 汽车，虽然从未投入生产，但这个杰出设计预示了二战后的平价法国汽车 2hp 雪铁龙的出现，它体现了波纹金属板在法国现代传统下的运用——或许它是对1937年在德国投入生产的大众汽车的一种法国式回应。例如德国大众著名的甲壳虫汽车就是战后生产的，而法国 2hp 雪铁龙就与甲壳虫旗鼓相当——无比轻盈、造价低廉、小引擎、车速适中、经济实用，这也是雪铁龙风靡欧洲大西洋两岸的原因。其实法国建筑师让·普鲁维 (Jean Prouve) 也属于这种技术传统，主要表现在对玻璃和钢铁工艺的经济性运用，例如他1935年设计的克利希人民宫 (Maison du Peuple)，通过移动墙体系统、灵活性构件、开放式屋顶、钢框架和预制金属板，创造出多功能的开放空间

(图6)，能适应交易大厅、电影院、市政厅和办公室等各种功能，1984年甚至被列为建筑遗产——但最近未能免于被扩建的命运。所以，拉卡顿和瓦萨尔是对这种法国现代技术传统的延续：他们表现出对本土传统技术的文化敏感性，而批判地域更多描述的是建筑与土地和景观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它们是不同的。

五、建筑文化与政治性

S: 您在《现代建筑》中对他们的评论也很精彩：“他们通过最低成本提供更大空间的题旨正是对温室技术利用背后的存在意义 (raison d'être)”，我最近还读了您的博士生朱涛的文章^⑩，文中说您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建构文化创造一种“公共显现”的空间——又回到了阿伦特的概念。从这点可以看出建构文化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材料和构造，还有文化批判和政治构筑意义上的潜力，您怎么认为？

K: 这里我再次强调功能策划，功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公共空间或许比结构和材料表现重要得多，甚至远超建构。我不记得柯布西耶在何处说过这句格言：“要想做设计，首先要有处理功能的聪明才智。”听起来有些反讽，但足以说明理解功能问题对公共空间振兴至关重要。提到批判地域主义的政治潜能，我想到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城市规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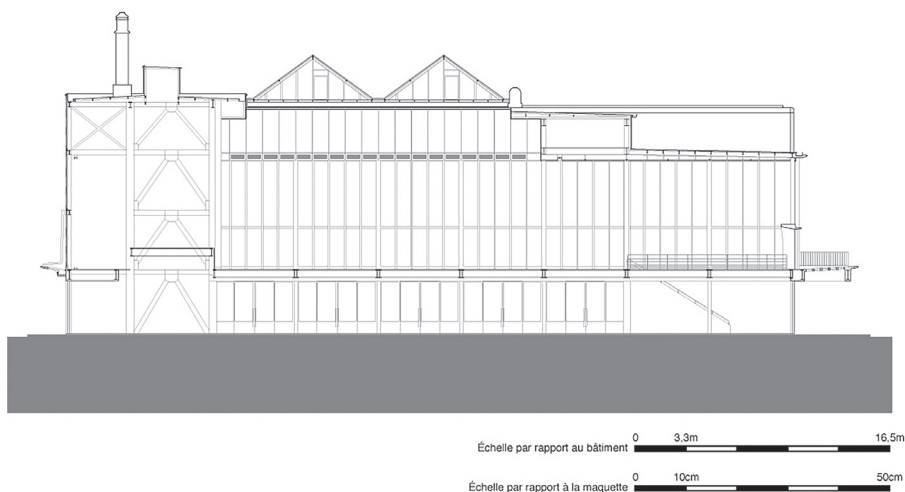


图6：克利希人民宫，巴黎，Jean Prouve & Marcel Lods, 1935—1939年

引入快速公交系统 (BRT)。由于 1943 年的规划未能满足战后的城市扩张, 1965 年的新规划将它变成带形城市——带形通道成为房产开发的汇集地, 增加了公交的可持续性。此后库里蒂巴形成了独创的三重道路系统, 分别是 BRT 专用道、辅助车道和单行车道。BRT 车道两侧设有上下车的圆筒形站台, 越靠近它的街区就有越高的开发强度, 所以 BRT 建设大获成功, 基础建造费用甚至比其他轨道或地铁都低廉。重点是这些容纳百人的公交车原由瑞典汽车品牌沃尔沃设计, 市长杰米·勒纳 (Jaime Lerner) 告诉我, 他们的工程师在沃尔沃的技术支持下自主修改了公交车单元的初始设计, 顺利解决了城市问题。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批判文化同时也是技术性的, 我们误以为文化和技术是对立的, 但它们极易融合。巴西技术人才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本土设计研发公交车投入建造, 因此这种去中心化的文化是鼓舞人心且充满前景的。

S: 的确, 城市文化和公共空间议题在今天全球疫情时代愈发重要, 最近我们都习惯线上工作, 例如建筑师董功提出疑问: “既然有手机看电影, 何必去电影院呢? 既然可以线上欣赏画作, 何必去美术馆呢? 既然能在 PAD 上阅读, 何必去图书馆呢?” 这是后疫情时期的反思, 您认为此后的公共空间将何去何从?

K: 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视角来看, 公共空间都没有替代品——人类本能的需要在生理和心理上聚集, 这是无可替代的。网络不能提供与公共空间相同的环境, 因为人的社会属性、情绪抒发、即兴表达以及社交行为的自发性和即时性是缺失的, 当然科幻小说经常设想未来社会在虚拟网络运作自如, 但终究要回到“我们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 人类的本能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社会从诞生至今, 都是使人们团结起来发展出“社会”概念, 身心产生相互联结。关于虚拟网络的未来, 我认为相信脱离物质联系也能完成社会运作是狭隘的见解, 当然人们能在线获取、交换、操控几乎所有信息, 数字技术在经济

领域更是势不可挡, 数字化已深刻改变了不少机构, 例如亚马逊的初衷是对社会的完全垄断, 它的控制力基于消费和商品文化, 使人们得以在线购买任何商品, 它则尽可能剥离人的一切个性和情感——最好任何事都能通过机器人完成。从晚期资本主义视角来看, 这是它的最终目标, 但我认为这是极有害的。

S: 没错, 物理意义的公共空间永远不会被网络取代, 因为人类对于聚集有本能需求。您最近两场学术讲座标题都包含“反思”这个词, 谈到疫情之后对当前建筑学行业和教育的深刻反思。在建筑文化层面, 您说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杂志都是西班牙语, 世界上真正有建筑文化 (而非一两位明星建筑师) 的四个国家分别是芬兰、日本、西班牙和法国, 还谈到如今评论家的角色问题, 您觉得评论家、理论家或杂志主编在今天建筑学科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K: 这个问题当然因地制宜, 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评论家和主编——张利和李翔宁, 他们都运营着重要学术期刊, 对建筑理论颇有见解, 通过各种媒体将中国建筑图景生动地展示给西方世界。我确实谈过建筑杂志的问题, 但你刚才的提问糅合了两场讲座的内容: 两场演讲我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讲稿。“世界上真正有建筑文化的四个国家分别是芬兰、日本、西班牙和法国”是我 2005 年在《现代建筑》第四版写到的, 当年我选取了这四个国家, 例如日本有完整的建筑师传承谱系, 当然很多人对建筑文化有不同定义, 但我相信建筑文化绝不仅指某个地方出现了天才建筑师, 而是要形成一种代际体系或建筑生态。而今天的中国就有颇具辨识度的建筑文化——基于中国的本土性和对材料的深度研究产生了同一代优秀建筑师, 这是我理解的建筑文化。

六、当代建筑学反思

S: 您当时除了谈建筑文化, 还说到建筑史、哲学、消费文化和技术主义等议

题, 如果您总结最近的这些“建筑学反思”, 您觉得有哪些需要强调的?

K: 我最近恰好在回顾 1960—1980 年一些事件对我思考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 1960 年我开始关注现代建筑, 1965 年从英国移民到美国, 当时在普林斯顿教书, 其中 1980 年对我很特殊。因为班纳姆 1960 年出版了《理论与设计》——或许是继西格弗里德·吉迪恩 (Siegfried Giedion) 1941 年的《空间·时间·建筑: 一个新传统的成长》之后最重要的关于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读物, 我的第一版《现代建筑》恰好在 1980 年出版, 巧合的是, 我与班纳姆、班纳姆与、彼此吉迪恩都隔了 20 年。这里提班纳姆, 首先是因为长久以来我深受他的理论影响, 其次是他对现代历史的批判性的评注令我印象深刻, 这种方法论也渗透在我的《现代建筑》全书。近年的反思源于我对自己的双重定位——或许既是建筑师, 也是杂志编辑或理论研究者, 当然多数时间在教学、写作和评论而非建筑实践。

首先是对奇观 (spectacle) 的反思, 这是一种对一味追求宏伟尺度的巨型建筑的批判立场。如今对毕尔巴鄂效应的盲目崇拜在欧洲屡见不鲜, 例如赫尔佐格和德梅隆 2016 年做的汉堡音乐厅, 它的曲形玻璃幕墙体量建在废弃的砖砌港口仓库上, 不为人知的是起初预算约 2 亿美金, 最终却花费了 4 倍, 造价十分惊人。这种现象的开端就是 1995 年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一座巨大的雕塑。这些都促使我思考“大都市带”的问题。密斯 1943 年在一篇短文里写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再造城市了, 所有规划过的城市就像森林一样生长, 我们必须学会在丛林里生活。”当时芝加哥和中西部几乎没有边界, 所有城市都在疯狂蔓延, 因此我说密斯是个能预知未来的人 (clairvoyant) ——他的评论比吉恩·戈特曼 (Jean Gottmann) 提出“大都市带”的术语还早 20 年。戈特曼在 1961 年说“大都市带”在发达国家大量蔓延, 我们再也无法维持棱角分明的城市形态了, 甚至城

市规划学科也面临巨大危机，几乎所有规划都沦为土地使用的分配和物流分布。我们今天只有“大都市带”而非城市，几乎不可能再创造传统的新城市了。我们没有妥善利用土地，这是我反对郊区化提出的论点——汽车是消费主义的灾难，它的普及极大改变了城市形态，它造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也对人类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人们在交织的立体高速路间难以呼吸，对土地的不经济使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郊区化现象，郊区化与商品化是天作之合。我想到建筑师杰弗里·吉利柯 (Geoffrey Jellicoe) 提出的理想都市环境 (Motopia)，郊区化促进了汽车普及，正是这种破坏性的土地利用使我们对未来迷茫，长远来看后患无穷——美国每年有300万英亩农业用地因郊区城市化而消失，却很少有新的公交设施建成，汽车主导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非场所 (non-place) 的城市空间——购物中心、高速公路和酒店旅馆。它们缺乏场所意义，因为人们在其中无法获得公共显现。

接着我开始思考人的“栖居” (settlement) ——听起来像中世纪的词汇。我认为柯布西耶和密斯一样是预言家：他1949年位于法国南部的项目 Roq et Rob，是典型的地中海沿岸风格的本土建筑——圆筒形穹窿顶的住宅像烤架般排布 (图7)，其间通过庭院隔开，这种建筑如今体现在美国郊区随处可见的由横墙

与院落组合的院宅，对汽车和行人都有较高的可达性。

这个议题自然和批判地域主义密切相关，此后的《建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地域的思考——我用“建构”来形容建造的诗学，当然两者都与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关，正如我说过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促成公共显现的空间，因此我展开了对城市公共性的思考——巨型。2009年我到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针对高速城市化的背景提出“巨型”的授课主题。首先是因为城市尺度的公共干预相对有限，而多数城市的变化是不稳定的，传统规划作为城市设计工具已经捉襟见肘了，如果继续使用钢筋混凝土推动城市化就会酿成环境灾难，因此如果没有混凝土，城市会呈现全新形态而非大都市带；其次是城市化要依赖新的技术，因此我提出“巨型”作为对大都市带的空间干预——将创造场所的巨型融入场地，因为它有塑造公共空间的潜力，能抵抗环境的商品化。正如我说“巨型作为都市景观”，所以接下来是景观的议题——我一直强调建筑和城市更应向景观学习而非反之。唯一能缓解目前大都市带趋势的手段是景观介入，它也能促进环境保护——景观会改善热岛效应，但现状是景观建筑师往往是建筑话语中的匆匆过客，这是极大的遗憾。以上是我对近期建筑学反思的简单总结。

S: 这些反思都很有启发性，还有来自读者谢依含的一个行业问题：我们常说建筑师的培养耗时很久，您认为原因为何？学习固然离不开反复锤炼，但今天计算机技术帮我们更快完成迭代推敲，无论在推进设计还是效果方面都大有裨益，您觉得未来一位40岁建筑师可称成熟建筑师吗？

K: 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我们知道建筑学是一个无比贴近现实的学科——建筑师每天都面临现实问题，哪怕一座小房子都有特定的场地、功能、预算、建筑规范和气候等诸多问题，可以说比其他学科面临更多现实的复杂性。其次，我觉得“建筑师到40岁才成熟”是民间传言，未必是事实，但你刚才说到“数字技术帮助我们更快完成设计迭代”，这确是实情，由于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迭代和经验，便能更早成为成熟的建筑师，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我觉得这仍是过度简化的思维。计算机技术的确带来无与伦比的优势，但它的缺陷同样明显，即概念的问题，如何用更直接的物质方式来进行空间想象？例如绘画是一种连接双手与大脑的行为，我记得建筑师张轲有一些很动人的手绘图，这些都直接脱胎于建筑师的内在想象力，所以计算机并不是最佳工具，因为它通过理性算法抑制了我们大脑自然生发的想象力。在法语中，“大脑” (mind) 和“精神” (spirit) 是相同单词，这和英语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往往将大脑和精神分开解读。数字技术固然有大量优势，但它无法取代大脑和双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在未来的虚拟网络世界必然会销声匿迹。

S: 感谢您的精彩回答，这是非常珍贵的交流机会。几乎每位建筑系学生手上都至少有一本您的著作，这足以说明您在建筑理论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再次感谢。

后记

从弗兰姆普敦的回答中不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建筑学反思脉络：大都市在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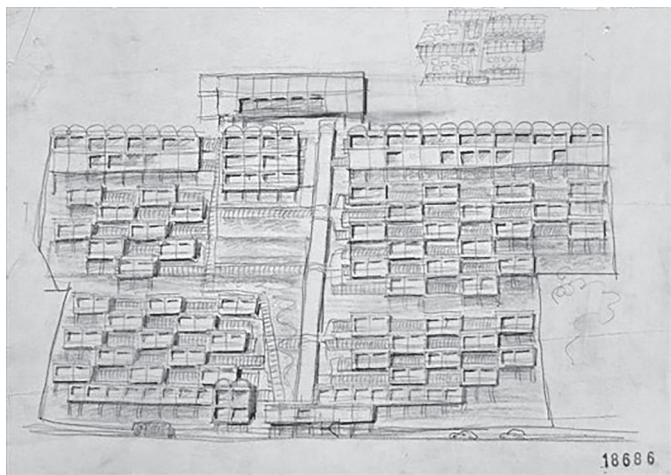


图7: Roq et Rob, Roquebrune-Cap-Martin, 柯布西耶, 法国, 1949年

本运作中日益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城市空间渐趋商品化、士绅化和碎片化，传统城市设计断难施行，人们身处其间无法获得“公共显现”，所以“巨构”理论应运而生——嵌入地景同时缝合破碎的日常生活，再造批判性的景观与显现空间。另外，奇观的图像消费席卷全球，1980年双年展的后现代视觉盛宴甚嚣尘上，他对此提出批判地域主义和建构文化中“建筑的本质是建构的而非布景术的”的坚定立场，将空间的感知从视觉这种单一感官剥离，拉回对建筑本质的探讨，甚至包括凉热的感知、材料的气味、砖石的触感、步伐的推力、身体的惯性、足底与地板的共振等，这无疑引入了知觉现象学（感知与触感）的探讨，同时引入阿伦特的“公共显现”使行动者的行动与公共空间的辩证关系融入建筑讨论，揭示了建构诗学的政治维度，同时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中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挪用与表演的构建潜力遥相呼应，暗含一种充满反抗意志的建筑学思考方式。

因此批判地域主义和建构理论都是“后卫性”（*arriere-garde*）的建筑策略，它们在实践上必须时刻保持批判性的态度才能维持自身价值，而共同点或许是：揭示建筑学本体与表现之间的固有矛盾的同时，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劳永逸的信条——我们无法界定包含哪些要素就属于“建构”或“批判地域”。因此，他提出的是问题或话语而非结果，是一套开放且诗意的话语场域。这恰是它作为理论的核心价值，孕育了一种充满抵抗性的批判文化能力，这种“抵抗”绝不是一方抵抗另一方，它必须将自身从民族主义和保守怀旧的地域主义中剥离而出，是一种双向调和（*mediation*）的过程，它首先要解构自身必须继承的世界文化，然后通过整合矛盾来实现对普世文明的批判。此外，他通过“建构文化”从建造和物质层面对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立场加以巩固，批判了普世技术的统治地位对培植地域文化的负面影响，例如无处不在的空调系统几乎使建筑开窗无用武之地，无孔不入的人造光线使美术馆的艺术品沦为商品。同时他提出“场所—形式”（*place-form*），从制度层面强调“边界”的重要性，批判了当代城市中忽略人类政治潜能的“伪

公共空间”（酒店、购物中心等）。因此他的观点从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拼贴布景术两座大山之间闪烁而出，发展出“成一家之言”的抵抗的建筑学——在建筑本体上强调建构与建造诗学的意义，在文化上弘扬批判地域主义以与浪漫煽情的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距离，抵抗席卷全球的均质化现代文明。

尽管弗兰姆普敦对消费社会视觉盛宴的“奇观”警醒怵惕，但似乎又意识到环境的商品化是势不可挡的时代主流，因此他坚持这种“抵抗性”和“后卫性”，通过建构文化寻求超越视觉的身体感知力量，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进行执着抗争。而他时常引用阿伦特的“公共显现的空间”就是这种抗争的终极目标，因此这些理论不仅关乎建筑本体的美学，更具备文化批判和政治意义上的潜力。弗兰姆普敦使我们意识到建筑与世界的关系不应只是抵抗、颠覆和对抗性的，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如此，建筑同样可以像放大镜般将人们的革新与试验无限放大，所以他为我们提供了无比辽阔的洞察世界的视野以及追寻建筑文化的热情与能量。

但其中有一点值得警惕，虽然传统文明与普世文化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但我们绝不能照搬批判地域主义的“传统与现代”的抵抗框架并用它指导实践。尽管张永和、徐甜甜、张轲等实验建筑师们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作品，将传统文化（竹、木、砖瓦等农业时期元素）相得益彰地融合到现代技艺之中，受到全世界关注，王澍甚至在2012年荣获普利兹克奖，这种实验性已然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风格”，但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策略显然不是坚决抵抗的，它更多是一种“发展”与“参与”的状态而不是“抵抗”。尽管王澍大量使用传统自然材料（瓦片墙）与悬垂屋顶，但他并未抵抗普世文明与全球文化，甚至他的很多建筑形式是现代的（如宁波博物馆），是主动“参与”世界、融入全球的。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国当代建筑的这种“地域性”视为一种“发展”而非“抵抗”的状态，它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与现代运动别无二致，都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这或许能为我们当代建筑的探索提供一条可能的新路径。

注释

① 1983年弗兰姆普敦在《反美学：后现代文化文集》(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in Postmodern Culture)中发表《走向批判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点》(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论文，将批判地域主义提升到建筑伦理层面：批判地域是现代主义垄断大潮下文化反抗力量的希望，承载着调和普世文明与世界文化的责任。

② 2018年4月18日弗兰姆普敦荣获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时，主策展人Yvonne Farrell和Shelley McNamara评论说：“他在促进建筑的关键价值及其社会作用方面是真理的声音。”(He stands out as the voice of truth in the promotion of key values of architecture and its role in society.)

③ 2020年8月30日，“全球知识雷锋”作为2020年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合作媒体，于纽约Athens 24 Brick Row采访弗兰姆普敦(联络：孙志健，采访：翁佳，摄影：叶天威)，采访全文《再论建造诗学》于2020年9月7日发布于“全球知识雷锋”公众号，文本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cCEdMtO44msW_bfr2-nWw。

④ 弗兰姆普敦于2021年4月29日在利物浦大学举办题为《反思建筑学的困境：七点回顾》的讲座，讲座原址为<https://stream.liv.ac.uk/7fujymst>，同年5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举办相同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原址为<https://vimeo.com/537453308/c29814b272>。

⑤ 斯坦·艾伦(Stan Allen)在2017年11月6日于弗吉尼亚大学举办题为《Bodies of Architecture》的讲座，谈及2015年“罗马20-25：新的城市生命周期”展览中其团队作品深受弗兰姆普敦mega-form理论的启发。讲座原址为<https://youtu.be/QFpw5nDT4vo>，讲座译文2020年5月6日发布于“全球知识雷锋”公众号(译者：孙志健)。

⑥ 2016年5月29日弗兰姆普敦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题为《Mega-form as Urban Landscape》的讲座，谈到mega-form和megastructure的区别时认为“mega-form注重内在空间秩序和形式织体的全局整体，并不必要去凸显结构的表现，看似表现出megastructure的形式特征，但不拘泥于此”，因此mega-form译作“巨型”而megastructure译作“巨构”。讲座原文《“巨型”作为一种抵抗的建筑学》发布于“有方空间”公众号(作者：赵德利)。

⑦ 槇文彦(Fumihiko Maki)的1964年出版物Investigations

in Collective Form中提出了集群形态的三种范式：巨构形态(mega-form)、构成形态(compositional form)和群形态(group form)。他认为集群形态是一系列可被组合的相似建筑，描述巨构形态时同时用到mega-form和megastructure两个词。

⑧ 亚历山大·佐尼斯于1981年在《网格与路径》(The Grid and the Pathway)论文中创造了“critical regionalism”一词，力图反对二战后席卷世界的现代主义风潮，他们表达了对国际风格与假托古典的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抗，通过强调地域性将建筑视角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历史主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关注人文地理的独特性，表达一种关注具体环境的寻求新路径的姿态。

⑨ 弗兰姆普敦曾引用法国地理学家吉恩·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1961年出版的《大都市带：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内容来表达自己对大都市带的观点：“这种城市的变化因为它的散落解体，已不可能从物质角度辨认出所谓实体的城市，只能歪曲剥夺城市所有的公共含义”。故此处译作“大都市带”。

⑩ 盎格鲁-意大利(Anglo-Italian)，本意指混合英国和意大利血统的人，后泛指极具聪慧才智的人。

⑪ 亚历山大·佐尼斯(Alexander Tzonis)在文章中提出regionalist与regional的区别，与地域主义和地方的直接复古主义的区别相似，regionalist指一种主动建构群体身份的意向。

⑫ 弗兰姆普敦2019年索恩奖章获奖时题为Five Voices: On Kenneth Frampton的演讲，讲座原址<https://www.soane.org/soane-medal/five-voices-kenneth-frampton>，演讲全文《建造的诗歌，促成“公共显现”》在2020年12月16日发布于“空间行动”公众号(译者：朱涛，朱逸蕾)。

参考文献

- [1]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M]. 王骏阳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 [2] 朱涛. “建构”的承诺与虚设: 论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中的一个观念[M]//朱剑飞. 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 历史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66.
- [3] [荷兰]亚历山大·楚尼斯, 利亚纳·勒费夫尔. 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M].

王丙辰译. 汤阳校.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1-39.

[4] 朱剑飞, 孙成, 张璐, 王澍与李承德: 杭州中国美院校园设计比较研究及西方批判地域主义论述之检讨[J]. 建筑师, 2021(2): 4-16.

[5] Gottmann, Jean.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The 20th Century Fund, 1961.

[6] Kenneth Frampton.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M]// Hal Foster.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shington: Bay Press, 1983: 16-30.

[7] Kenneth Frampton. Megaform as Urban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ym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009, Printed in 2010.

图片来源

图1: “全球知识雷锋”公众号, 原报道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WcCEdMtO44msW_bfr2-nWw

图2: Enric Miralles + Estudio Carme Pinos, Archdaily于2013年发布, 原图网址: https://www.archdaily.com/375034/ad-classics-igualada-cemetery-enric-miralles-carme-pinos/529e6c2de8e44eca5b00012c-ad-classics-igualada-cemetery-enric-miralles-carme-pinos-plan-and-sections?next_project=no

图3: Paulo Mendes da Rocha拍摄, 原图网址: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6/arts/design/paulo-mendes-da-rocha-dead.html>

图4: Stephan Zimmerli拍摄, 原图网址: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nemotopy/6167331957>

图5: GA Document 2, 1980年第19期, 原图网址: <https://rnrdrd.com/?y=1&b=280&s=291&c=8&p=427>

图6: Sylvain Le Stum architecte绘制, 原图网址: <http://sylvainlestumarchitecte.blogspot.com/2010/11/larchitecture-le-patrimoine-et.html>

图7: Le Corbusier, Oeuvre complete, volume 5, 1946—1952, 原图网址: <http://www.fondationlecorbusier.fr/corbuweb/morpheus.aspx?sysId=13&IrisObjectId=6184&sysLanguage=en-en&sysParentId=65>